

師苑教育叢書 381

教育的文化/文化的教育

Cultural Studies Goes to School

張盈堃 主編



師大書苑發行

G57.58
20102

教育的文化／文化的教育

Cultural Studies Goes to School

張盈莖 主編



師 大 書 苑 發 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育的文化/文化的教育:Cultural Studies

Goes to School / 張盈堃 主編.-- 初版.--

臺北市：師大書苑, 2008.05

面； 公分

ISBN 978-957-496-596-0 (平裝)

1. 教育 2. 文化 3. 文集

520.7

97007689

教育的文化／文化的教育 Cultural Studies Goes to School

主 編：張盈堃

發 行 人：白文正

出版·發行：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47 號 11 樓之 2

電話：(02)23973030 · (02)23979969

(02)23979899 · (02)23973389

傳真：(02)23975050

網址：<http://www.shtabook.com.tw>

電子郵件：shtabook@ms38.hinet.net

郵撥：01386168

經 銷 處：師大書苑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82-3 號 2 樓

電話：(02)83695556~8

傳真：(02)23690888

出版登記：局版北市業字第 195 號

電腦排版：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初 版：2008 年 5 月

定 價：新台幣參佰貳拾元整

本書的貢獻者

主編簡介

張盈堃—屏東教育大學幼教系助理教授，曾服務於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中心兼任助理研究員、花蓮教育大學初教系兼任助理教授。博士畢業於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課程與教學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批判教育學、教育社會學、課程研究、文化研究，以及酷兒／性別研究等。

推薦序作者簡介

莊勝義—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英國曼徹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教育學院哲學博士。研究領域包括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與多元文化教育。

作者簡介

(按章節順序)

作者	現職
翟本瑞	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暨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夏林清	輔仁大學心理系主任
王柏偉	德國柏林鴻堡大學教育史教席博士生
張盈堃	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助理教授
彭奕婷	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碩士
邱韻芝	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碩士
林昱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達努巴克	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理事長
錢清弘	宜蘭縣梗枋國小教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 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陳伯璋	致遠管理學院教育研究所教授、台灣教育社 會學會理事長

推薦序

教育如何與文化研究結盟—從「牽拖／藉口」到「牽引／接頭」談起

莊勝義

台灣多年來的教育論述中，往往以「文化被剝奪」或者「文化不利」等字眼，指涉所謂的弱勢團體學生，學業成就偏低或學習不利的主要原因。這樣的措詞，不僅出自中央與地方教育行政人員、學校教師的言談，也出現在教育學術研究社群的論述裡。從「教育優先區」的相關方案、文獻，不難找到證據。教育部十多年來的教育優先區計畫，直到民國 92 年的計畫才以「文化資源不利」取代往年慣用的「文化不利」字眼。類似這樣可能將文化差異「歸因」成文化偏差或差距的論述，也可以在類似所謂的「教育問題」之論述中發現，尤其像「原住民教育」、「新台灣之子（女）教育」，幾乎被先入為主地「問題化」為原住民、新移入女性的文化或語言或適應問題。至於青少年文化，被以「偏差行為」或「犯罪行為」取代其中的「文化（或次文化）」字眼，則可利用本地的資料庫或網路搜尋，見證台灣教育界對「文化」議題或「文化研究」，存在的生疏或偏見。

異於主流的少數或弱勢團體，在所謂主流團體的眼中，幾乎沒有足以顯示其個人主體意義的身分與文化，他／她們或被稱為原住民族（儘管政府依法認定了十三族），或被稱為「外籍配偶」、「新移入女性」，或被稱為「××障礙」等等團體，這些團體之間的分歧與團體內個人之間的差異被稀釋了，而其與主流團體之間的差異則被扭曲地放



大。異於主流團體的因素經放大後，並未轉成「因材施教」的教育訴求，卻往往淪為各種刻板印象、偏見，或歧視的根源。在團體中（大如台灣社會或小如某一班級學生），「異類」往往是被特別注意的焦點，也成為藉口或牽拖的擋箭牌（將班級平均成績拉下的拉拉隊；為提升其學業及改善其生活而投入更多的資源；「新台灣子女」的父親這一方面的因素被隱藏著，而將其生長、學習，與適應等，直接連結到他／她們的媽媽之語言或文化因素）。這大概是當前台灣教育中的文化之一些寫實。

另一方面，以延續文化為目的（藉口）之教育設計裡，主流團體的語文教育，長年來由大漢沙文主義結合英美帝國主義（藉國際化或全球化之名）主導，國語文及英語文都成為國民教育的「主科」，相形之下，台灣各類本土語文的教育，即使經過這幾年所謂「本土化」的努力，也幾乎是形式上聊備一格，雖有挽救即將消逝的語言文化之政策宣示，尚未見到實質的成效。近幾年的國中生「基測」，考生若沒能掌握選擇題之題幹的意思，則不易正確地選答。就這個現象而言，似乎可解讀成：在所謂「本土化」的操作以及大漢沙文主義反撲的情況下，「仙拚仙害死猴齊天」，出身非漢語系的考生，簡直成為二者競逐下的犧牲者。

當「他／她媽媽的語言」遇到「他／她爺爺的語言」時，一個被詛咒，一個被歌頌，這難道不是台灣教育對待文化差異的事實嗎？

歷來對於教育應該是什麼，應該如何安排，以及對於教育事實上是如何進行的，都有許多的論述。不論這些教育論述的理論淵源是來自深思熟慮（deliberation）的結果、來自對過去教育實踐的經驗或觀察、或來自對當時社會文化與教育作為的反應，都至少展現一種說服的力量，同時跟其他的理論或論述間，維持著競爭的關係。例如：杜威所謂的「教育即生活」，對照史賓塞的「教育作為生活的預備」；結構功能論者對教育的「社會化」功能之強調，對應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¹對於「解社會化」(或譯「損社會化」²de-socialization)的重視；教師與教材為主的教學觀，對照學生為主的教學觀；學校本位的課程觀，對照實踐國家或社會理想的課程觀，……都展現論述的權力(或力量)競逐。

如果因應多元文化與全球化同構的人類處境，成為當前教育所應關注的「政治正確」，則前述被當作「牽拖／藉口」或「詛咒」的教育論述，都應該被揚棄。類似「漢語系和南島語族在數字發音與算術運算之心理歷程」的研究，從看到(文化)差異(漢語系數字都是單音節，南島語族有些數字超過二個音節且有較漢語複雜的構音)深化(教育)意義，擴展世界／視界，立基於本土文化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例如，藉由南島語族文化中的「教育與傳承」，理解台灣主流教育論述中的「他／她者」(Others)之真實世界(重視“dialogic validity”)，以解構台灣主流教育論述中的種種「文化霸權」(訴求“deconstructive validity”)，掌握多元文化與全球化共構下的台灣歷史文化脈絡(強調“contextual validity”)³，重建足以回應多元文化、挑戰文化霸權、轉化教育與文化深層結構的教育理論與作為。這樣的企圖，由上述三類文化研究取徑，提供概念工具、思想資源、以及意義系統，牽引教育論述與實踐，以結合此地／此刻人群的生活、生存，與生命情態。至

¹ 台灣教育社會學界，曾費時在中(漢)譯的爭論上，有人主張應該譯為「批判教學論」而非像一般流通的「批判教育學」。然而，如果因譯名之爭，造成論述力道的相互抵消，則無異忽視批判教育論述「結盟」的意義或 Antonia Darder, Marta Baltodano, 與 Rodolfo D. Torres 等人(2003)所謂的「團結政治」(politics of solidarity)之重要性，也可能失去對所謂「文化殖民」的反思、反抗、反叛，或減損可能形成具本土味道的批判教育論述之有利條件。

² 如張光甫(2003)對 Paulo Freire 的理解，認為應將 de-socialization 譯為「跟別人不一樣」(p. ix、p.478)，意即教師在教室中營造減損「社會化」的氣氛，以協助弱勢族群或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童，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免他／她們因受到主流社會文化價值的籠罩，而被邊緣化為沉默的一群。

³ 這裡所提到的三個效度概念，參考自 Paula Saukko (2003)結合文化研究的不同方法論之企圖。



於具體方案爲何？有待更多有心人一起來發想、對話，激盪出智慧的火苗，點燃行動的熱情。

本書編者張盈堃博士，悠遊於教育與文化研究間，他透過精心的學術研討會安排，提供文教工作者之間對話的平台。本書各章內容或立場可能不盡然相容，而各作者對「教育」或「文化」的詮釋也可能有分歧，但是本書主編企圖連結文化研究與教育研究的用心，則是毋庸置疑的。由不同經驗或學術背景的作者，所集結的著作，與其說企圖宣示共同的見解或立場，勿寧是在彰顯不同的教育與文化觀察、想像，或論述。因此，本書提供給讀者的是多元開放的對話可能性，而不是萬流歸宗的真理再現。讀者從本書中，看到教育與文化的複雜關係，擬情理解和合理批判當前教育與文化實踐及研究，進而轉化對日常生活世界的認知與行動，乃是推薦這本書的主要目的。

參考文獻

張光甫（2003）。*教育哲學：中西哲學的觀點*。台北：雙葉。

Darder, A., Baltodano, M., Torres, R. D. (2003). Critical pedagogy: An introduction. In Antonia Darder, Marta Baltodano and Rodolfo D. Torres (eds.) *The critical pedagog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pp. 1-21.

Saukko, Paula (2003). *Doing research i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nd new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London: Sage.

主編序

另外一種教育敘事／另外一種 日常生活的呈現：教育與文化研究

張盈堃

本地教育研究社群興起一股對文化研究討論的熱潮，本書的出版也可以算是這股熱潮的體現。一般來說，文化是個迷人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所持有的文化概念，造成彼此對這些議題有著不同的看法與爭論。整體而言，不論是堅定的唯物論者抑或是典型的唯心論者，這些學者大多同意文化為人類所獨特創造出來的成就，也就是二者均強調文化的平常性（cultural ordinariness），以及人們在建構共享意義實踐時的主動性與創造力，諸如物質、精神、理念和符號等等。據此，英國文化研究執牛耳地位的 Raymond Williams 曾說過：「一種文化會有兩種面向：已知的意義和方向是其一，該文化的成員學而知之；另外一種面向是新的觀察和意義，供人測試……我們用文化一詞代表兩種意思：意味著生活的全部方式——即共享的意義；也意味著藝術與學習——探索與創造活動的特殊過程……。文化既是藝術，也是日常生活裡頭的價值觀、規範，因此我們可以說一方面文化關切著社會再生產的問題，但另外一方面也關切著創造力與變遷的可能」。

有關文化的定義很難獲得一種明確性的概念，就像 Stuart Hall 認為在這個領域中，雖然有一些廣泛的原則，但是並不需要監控一個政治正確的文化研究邊界。因此，文化可以是結構，也可以是行動。多數的研究者已花了不少篇幅討論文化的結構面向，也就是偏重在文化與意義詮釋二者關係的分析，但文化的行動面向常常為研究者所忽略，因此美國學者 Ann Swidler 指出，文化社會



學研究長久以來認為，文化扮演類似「鐵路轉轍員」(switchmen)的角色，文化提供行動所需要的動機、價值、規範、意義等，因而決定行動的進行方向。對 Swidler 而言，此一研究取向忽略了文化具備類似「工具箱」(tool-kit)的功能，即人類在行動時，可以從文化中取得所需的操作要件。換言之，文化可以讓人知道「如何」(how)行動，而非僅是告知「為何」(why)行動。因此，在此脈絡下，文化指的不只是行動的意義，文化本身也是行動。文化不僅是一套象徵系統，藉由此一系統，其成員可以對其生活世界進行意義的詮釋。文化也是具體的生活實踐，而此一實踐具備特定的行動能力，並且能夠產生特定的行動結果。換句話說，文化不僅能夠為人類生活賦予豐富的象徵意義，也能夠解決人類生活所遭遇到的生存問題。

在這本書裡，我把文化研究的焦點擺在「文化政治」與「日常生活」這兩個面向上。文化政治的分析焦點在於文化政治如何透過表徵、意義指陳及意識型態而操作。舉例來說，Hall 談到流行文化的意識型態時說到：流行文化產品的製造與銷售過程，實際上是生產者、銷售者與控制者在產品中結碼(encoding)的過程，但同時也是在他們精巧的操縱之下，使消費者與接收者解碼(decoding)的過程。Hall 認為整個流行文化產品的製造與銷售過程，並不是純粹的商業消費活動，而是在其過程中製造、注入、灌輸和宣傳結碼化的特種意識型態的過程，而教育何嘗也不正是如此。此外，批判教育學者 Henry Giroux 也指出文化研究的研究焦點是文化和權力的關係，它讓我們更理解政治和權力如何經由制度、語言、表徵和文化，穿越多樣性的時間、空間和慾望而產生作用。因此，文化研究是衝突的、動態的、發展的，文化研究可以成為知識和權威鬥爭的理論工具，挑戰傳統學術和學科所鞏固的特殊權威形式，這同時也對教育學術圈開啓了很重要的啓示。此外，日常生活是一種「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生活，大多數普通人過著某種一成不變、了無新意又習以為常的生活。一方面，它既是人類生活的最基本形式，但另一方面，從這個未經反省的知識場域，人們巧妙地組織起有系統、合乎理性的知識領域。日常生活並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方式，相反的，它是一種湧現(emergence)事物的場域。身處這樣場域裡，人們總是浮沈於這種起伏之中。日常生活中的人們蒐集了結合事物成為一整體的知識，以這樣的知識來引導他，讓他適當地面對、應付乃至處理諸事物。日常



生活中的一切既非混沌不明甚至隱而不彰，也不是某種盲目的混合或堆砌，而是依著某種關係結合的事物網絡，而這個關係網絡也正是本書企圖揭露與分析之處。

爲了讓讀者可以迅速地掌握本書所要傳達的內容，本書共分九章，爲了讓本書閱讀起來更具系統性，進而區分爲三大部分：(1)文化研究與教育現場的遭逢；(2)教育的文化：教育相關議題的文化政治分析；(3)文化的教育：日常生活裡的教育轉化與行動。

在第一部分：文化研究與教育現場的遭逢，在第一章裡，翟本瑞教授先從一些他過去的觀察、想法當作起點，來跟大家分享他爲什麼關心教育的問題。翟教授對於階級的關懷不遺餘力，他提到教育社會學裡的經典著作——1966年的《柯曼報告》。這份報告最大的意義，指出了家庭態度是對孩童學習成效影響最主要的因素。即便我們可以在師資、圖書、設備、教育經費上改善，但無法立即改變學生的家庭，因此，階級複製對教育社會學而言，一直是揮之不去的陰影，面對家庭與文化問題，往往也就無解。然而翟教授認爲我們需要把文化、社區及個人帶回教育場域的行動，因此他以南華大學山地原住民小學課輔的例子，一方面試圖打破原住民刻板印象的迷思，另一方面希望透過這樣的行動，喚起社會共識、家長的關心、要喚起學校老師的同理。最後，翟教授提出教學現場則必須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且能夠真正面對未來的學生，必須將文化、社區、家庭及個別化差異導入教育現場，才能真正讓學習成爲培養學生能力的重要程序。

在第二章裡，夏林清教授連結行動研究和文化研究這兩個領域，提出拮抗空間的協作關係。夏教授提到行動研究者即「反映實踐者」，這是針對已體制化之工具理性表現提出了「反映理性」的典範。此外，夏教授也提到「行動研究」本身必須「介入與扭轉教育現場文化的力量」，而「文化研究」需要思考「者是誰？」的問題，而「者與者的關係」亦即我這個人和你或他這個人，以及你、我、他的關係，也就是我們彼此之間抽象存在，卻實質作用著的一個多層次、多向度、多角度的社會關係的運作載體，因此二者之間需要發展拮抗同行的關係。然而行動研究手工知識的發掘是細水長流而非天花亂墜式的，據此「可操作性」的社會行動實驗就變得非常地重要，因爲「文化研究」重視人們



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常針對人們生活中的限制與壓制「無形」活動或操作進行研究，這便是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解放空間的抵抗性政治。

在第三章裡，王柏偉先生一開始就提出當我們使用「教育的文化／文化的教育」的時候，「文化」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這兩個文化概念所指的內涵是相同的嗎？我們談論的是「同一種」文化嗎？我們正在使用著文化這個概念，距離口語使用的文化這個概念有多遠呢？這樣的文化概念發揮了什麼功能呢？教育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因此他引用 Van Manen 對「文化教育學 (cultural pedagogy)」與「文化的教育學 (the pedagogy of culture)」兩者的說明。「文化教育學」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或是同一文化背景內，不同歷史階段對兒童教育的文化史研究，為的是能讓我們更理解孩童的世界。文化的教育學將問題擺在為了什麼樣的社會培養孩子的問題，也因為這樣，各式各樣的批判教育學也就是展現為「文化的教育學」這種形式。最後，王柏偉提出教育與文化的關係在於分別從教育系統外部與教育系統內部兩者來處理，如何與其他系統區分開來的問題。從教育系統的外部角度看來，「教育的文化」處理的是教育系統如何從社會系統中分化出來的問題，也就是教育系統如何把自身與其他系統區分開來的問題。另一方面，「文化的教育」所面對的，則是教育系統內部的「偶連性公式」這個問題，也就是教育系統必須在系統內部製造出一個關於「自我指涉／他我指涉」的統一。

第二部分〈教育的文化：教育相關議題的文化政治分析〉共有五篇文章，分別從階級、新移民、性別、種族與教師／教育現場這五個面向切入。在第四章裡，我所關切的問題為：是否追求更高的文憑可以促成階級的向上流動，並且解決階級的不平等？因此主要的任務在於分析文憑主義的意義，以及其社會運作機制，並且理解是什麼樣的隱藏因素促成與建構社會普遍存在的文憑病。我泰半同意 Bourdieu 關於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之品味秀異的說法，但是 Bourdieu 的整體論觀點，顯然在回答為什麼勞動階級的家長，在日常生活裡存有雙元邏輯，也就是在教育議題上，勞動階級的家長仍盡其所能提供子女任何可能的教育資源，就像中產階級家長面對教育關切時所使用的各種策略一樣。因此，在本地不論是中產階級或勞動階級，皆患了文憑病，但呈現不同的症狀：更高的學位文憑對中產階級而言，代表著階級地位的維持，但對勞動階級而



言，這是一種向上的社會流動。雖然許多的批判理論或批判教育學論述已經指出，學校本質上偏袒中產階級背景的學生，但弔詭的是，勞動階級卻深信文憑是最好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我認為這正是 Bourdieu 所謂的誤認 (allodoxia)，並以 Bourdieu 筆下的 oblate 作為這種階級流動下矛盾狀態的最佳寫照。

在第五章裡，我與彭奕婷與邱韻芝兩位同學針對新住民女性的新興現象進行分析。由於本地經濟結構的轉變，並配合相關的婚姻制度與手續之下，導致人口結構迅速改變，新住民女性的大量湧入，使得國內教育及社會各方面傳統運行之固定模式遂行產生變化。我們首先從新住民女性出現緣由，與子女的日常生活世界開始探討，如何在接納新住民女性並尊重其原生語言與台灣傳統父權主義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給予「新台灣之子」最佳的教育方式，是台灣目前最迫切需要探討的議題。而語言是社會生活上溝通的工具，語言的不利往往影響新住民女性子女在學習環境中人際關係上的發展，更易因語言文化上的隔閡引發學習問題。面對語言與文化的困境與弱勢，我們一方面從 Bourdieu 的文化社會學角度來探討新住民在語言結構上的不利，以及新住民其語言與認同的議題。除此之外，我們也關切是否有任何的教育策略，讓我們可以走出這樣的困境，特別可以把這些受壓迫者團結在一起，因此提出家庭讀寫 (family literacy) 的推動，來發展自我的認同。最後，我們認為認同其實乃是立場取向的問題；它不是一既定的事實，而是恆常處於演化的過程中。也就是文化認同是一件涉及「實存」(being)，也涉及「生成」(becoming) 的事。文化認同歷經不斷的轉化，絕不永遠固著於某一個本質化的過去，而聽命於歷史、文化、權力持續不停的遊戲運作。

在本書的第六章，林昱瑄指出學生經驗的優先性應是進行任何實踐或改革前所必須關注的第一步，但目前學生文化及青少年文化研究，多半從結構功能論的觀點出發，希望能達到矯正或輔導的效果，或者從偏差或是貶抑的角度指責、評價青少年文化。因此，林昱瑄認為過往研究不只抹煞邊緣孩子的文化意義和社會關係，也再製了上下階級文化資本的不平等階層地位。有鑑於此，她採用抗拒論的觀點研究一群「愛玩」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將其文化視為一種由特定階級行為、特定社會群體環境與社會意識型態和結構力量，共同交互形塑而成的實踐系統與生活方式，尤其重視這些青少年主體主動創造意義與文化生



產的能力。研究發現，這群少女的街頭文化具有幾項重要特性：多元的街頭智慧、主動表達情慾的能力、敢於對不合理的事情表達憤怒、靠自己長大、彈性的生涯觀，進而再分析她們的街頭文化，如何相對於學校官方文化而形成一種象徵性抗拒霸權的舉動，並從中擷取可供主流教育體系自我關照、反思的部分，以供批判教育工作者作為進一步的參考。

本書的第七章由排灣族原住民達努巴克先生所寫，他以行動研究為研究取徑，敘說他從一位原住民基層教師，選擇回部落工作之後的種種，從自組讀書會、開辦兒童電影讀書會，到部落大學教學的實踐過程。在一開始時，他強調真實的教育實踐與開放的行動對話才能是有用的教育論述，以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行動紀錄而言，這個紀錄不只是故事的描述，更是以自身經驗去理解，進而思考、採取以解放、回返人性為旨趣的教育之實踐歷程。文末，他嘗試對所謂「原住民文化」重新再生產新的定義。由於原住民文化常會被固定在特定的傳統樣貌，這樣的觀點忽略了人是創造文化、意義的主體。文化生產的過程在於人們對應於環境的創造性回應，重要的是創造的能力，人透過行動、勞動而定義自己，為自己創造文化。然而，原住民的文化課程卻往往受限於壓迫者的想像，只以這些被固定的特定「傳統」為素材，也以此回應「壓迫者」（或「殖民者」）要求原住民文化復振的政策，開課內容不外純粹技藝化的「雕刻」、「傳統歌謠」、「語言學習」等等課程，技藝學習成為目的，而文化創造過程中，人與人在部落共同生存的種種就只是點綴背景，稍稍提到之後就擱在一旁了。這樣的文化復振過程，提供給原住民小孩子的文化認同內容單一而且異化，學生不知道母語與自己有何關聯，反而對母語課心生反感，而且是與自己的部落人群是沒有連結的。因此，他希望這樣的行動取向能召喚有志一同的協力夥伴協助集體反映，並回返人性的行動。

本書第八章的作者錢清泓談到教師的情緒與庶民教育學的觀點，他指出雖然在 2006 年末修訂教育基本法，明訂校園嚴禁任何形式之體罰，以保障學生受教之相關人身權益。但層出不窮的校園體罰與不當管教事件中，教師情緒失控的現象近年來受到輿論各界的重視。只是，在事發後相關的媒體批評或官方說詞當中，大多將體罰問題歸咎於教師個人欠缺良好的情緒管理技巧，並要求學校教育工作者做好自我的情緒管理。然而，他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否適切，並



指出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導致教師出現負面情緒進而發生體罰的原因中，回家作業幾乎可說是列為首要。因此其探究焦點即在瞭解為何教師容易對學生的回家作業產生負面之情緒。他以 J. Bruner 提出的「庶民教育學」(folk pedagogy) 觀點來分析學生學習的心靈模型，對教師在處理作業相關問題時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此外，如何讓回家作業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形成一種相互學習的協作文化，而非個別考核的工具，亦為本文關注的焦點。因此，文末他引述 Eisner 的話來提醒教育現場的老師：「教育性的口號可以達到置換教育思維的目的，並使學校裡的實際工作者規避教育現場中積習甚久的老問題」。他認為 Eisner 這番話放在回家作業的脈絡來看，在教學現場出現的似乎是一幅弔詭的圖像：我們期待功課助學生學習一臂之力，然而，它卻往往變成學生生活中的苦差事，甚至是師生彼此的夢魘，而這樣弔詭的文化現象也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的地方。

在本書的第三部分〈文化的教育：日常生活裡的教育轉化與行動〉，由陳伯璋教授與我合寫，我們強調著在日常生活裡的課程美學創造與行動。課程美學乃是建立在文化的平常性上，以及人們在建構共享意義實踐時的主動性與創造力。這也是一種探索人們主動創造文化意義的方式，其焦點在於實際的生活經驗，並將文化視為日常生活的實際過程。我們認為所謂的美學就是由那些參與其中的人所構成的，故學校的課程正是由當地的師生共同參與創造，這樣的課程是由他們所共同構成的，這正是美學的課程，這樣的課程也體現了這群人共同的文化符碼。因此我們所要說的是：課程美學的理念就是 curriculum with the people 或 curriculum by the people，就是跟著民眾一起來參與和規劃。最後，我們反思台灣教育現場的集體文化往往追求對症下藥的處方，希望找到立即有用的策略或方法，但課程美學所要彰顯的，唯有教師與學生都能夠投入學習活動中，課程才是活的課程，學習者才能找到意義。因此這種透過美感感悟的相互引領，就像全面的覺醒這種自主性的獲得，而非被動地片面的告知或是規範教學的內容。因此課程的美學除了教科書的內容知識之外，應該加入師生主體經驗在課程實踐脈絡中的交錯，使得課程的文本在新舊經驗的流動中，相互編織著新的意義。

我總是很珍惜有機會在序言的尾端感謝孕育本書出版的一些人。這本書的集結出版，主要來自 2007 年 3 月 23-24 日於屏東教育大學幼教系主辦的「教育



的文化／文化的教育：Cultural Studies Goes to School」研討會，這場研討會裡有很多優秀的論文，但在篇幅與聚焦的考量下，我只能選擇其中比較偏重理論性質的文章出來，構成了這本書的架構。我無法把全部的論文轉換成專書裡的章節，僅能在此對研討會的論文發表者致意，感謝大家共襄盛舉以及提供精采的論述。在屏東這個學術邊陲地帶舉辦研討會是不容易的，聯絡、安排等工程相當地龐雜，我要感謝劉慶中校長、教育學院陳慶瑞院長與幼教系陳仁富主任的支持，以及幼教系、教育系與社發系部分同事與幼教系碩士班研究生的協助，大家通力合作下才造就這場精采的研討會。這本書能夠在短時間內呈現在讀者面前，我由衷地感謝師大書苑白文正先生與編輯團隊的支持與協助，在目前出版業不景氣的時代裡，一般的教科書不見得有付梓的機會，更不要說如此小眾的專書。

我想這本書只能算是教育與文化議題的起點，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學者出版相關的專書，挖掘文化研究的豐饒意涵，當然我也期許自己繼續走在這條迷人的道路上。

PS：本書的「Cultural Studies Goes to School」這個副標題主要採自 David Buckingham 於 1994 年出版的同名專書（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社發行）。這本書主要是談大眾媒體與教育、文化的關係，他強調教育的實施場域不只是學校的圍牆內而已，還包括了媒體。雖然本書並沒有任何一個章節談到媒體，但本書所要強調的教育不只是課程教學、班級經營而已，還包括了很多很多在圍牆內外的其他事情。